

许江 总主编
EDITOR-IN-CHIEF XU JIANG

CHINA ACADEMY OF ART
A JOURNEY OF 90 YEARS

国美之路大典

总 卷
PRELUDE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4-4
20182

国美之路大典

CHINA ACADEMY OF ART
A JOURNEY OF 90 YEARS

许 江 总主编
EDITOR-IN-CHIEF XU JIANG



中國美術學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国美之路大典》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许 江

副 总 主 编：高士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邦铎 王 浑 王 赞 毛雪非 孔国桥
刘 正 许 江 孙旭东 苏 夏 杨奇瑞
杨参军 肖 峰 吴小华 吴海燕 应达伟
沈 浩 宋建明 范景中 杭 间 周 武
胡钟华 姜玉峰 祝平凡 钱晓芳 徐国强
徐嘉木 高士明 黄 骏 曹意强 尉晓榕
傅巧玲 傅新生 管怀宾 潘公凯

总 卷

PRELUDE

上

I

高士明 主编

EDITOR GAO SHIMING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总 序

中国艺术的国美之路

许 江

路，各种足迹叠踏跬积而成的行道，从脚下伸向远方、伸向理想之地的通衢。它代表一种不懈努力的方向，一种持续行进的意志，也代表两边的风景，大地生成的脉络及其沧桑岁月、春秋品格，故有绘画之路、文化之路。国美之路正是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路。

国美之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中国美术学院历九十载而生生不息的一条文化之路。从1928年国立艺术院初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文化的20年，中国不仅请来了代表民主和科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请来了新文化的种子。国立艺专正是新文化的产儿，从那里开启了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的漫漫征程。这是引水之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新中国30年，借助共和国的力量，学院事业开渠奠基；伴随共和国的成长，学院亦历经艰辛。这是开渠之年。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40年，中国振兴的40年，也是学院事业的奔流之年。中国的艺术不仅回返人性和艺术本体的起点，而且回返传承和大地的根源。九十年来，我们学院始终以担当的文化使命、自觉的先锋精神、开拓的国际视野、诗化的智性意识，传承不怠、探索不止，勇于担当、其命维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凝聚几代人的学术生命，拓积而成一条内涵丰厚而又特色鲜明的路辙，映射着中国艺术教育世纪发展的沧桑浑厚的学术脉络，承载着东方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当代复兴的命运与品格。

国美之路是一条中国文化复兴使命的担当之路。1927年，时任民国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亲撰《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以拳拳之心，寄望西湖湖山对艺术大学的养育，寄望艺术大学对美育育人的担当。翌年4月8日，在补行的开学仪式上，蔡元培先生振臂疾呼：“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的生活。”这种创造美与培养爱美

民心的双重使命，深深地烙在了美术学院的旗帜上，烙在国美师生代代传承的心里。立此担当，以林风眠、潘天寿为代表的建院一代人，映身湖山，创立中西融合与传统出新的两条学术脉络，拓展艺术教育东方诗性的品格理想，虽长途艰险，却始终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旗帜。立此担当，在抗日救亡的烽火激流中，中华美术界的名师名家汇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坚守孤火传薪的“漂流课堂”，激扬青春热血的救亡丹心，担当敦煌和民间国宝的护卫，自觉高擎启蒙与救亡的使命理想。立此担当，在新中国初建时期，国美人怀揣革命理想，和老国立艺专的艺者专家们一道，践行人民艺术的思想，深入巨变的时代生活，创立浙派人物画、写实表现油画、民间风格版画、时代人物塑像等影响至远的艺术追求，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虽思痕斑驳，而使命坚守；虽屡有挫折，却理想依旧。立此担当，改革开放之后，国美率先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以突出的国际视野，以激越的民间自觉，以多元的实验方式，掀起“八五新潮”“九〇反省”等新世纪主体重建的重要的思想涌动，开拓传统继承、对外开放、融合创新的新局面。这样的代有传承、心存理想的师生群体，这样的逆流重生、自觉救赎的生命质量，这样的走向民间、融入时代的研究精神，正是国美使命担当的核心力量。

国美之路还是一条中国艺术教育的先锋之路。从建校伊始提出的“整理中国艺术，介绍西洋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纵贯九十年依然熠熠生辉的学术宗旨，到绘画、雕塑、图案设计和后来的版画、书法以及研究生、附中等重要艺术教育领域与层次在中国的最早设立；从抗日救亡、薪传西迁的烽火之路，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院校重组，系科北迁南调的共和国集结号，再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而开创的继承创新的新局面，美术学院始终是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秉使命而衔枚进取，

葆精神而矢志生发。新世纪以来，美术学院孤心独见，以一贯的先锋意识，整体观览全球境域与本土情境、传统艺术与新媒体艺术、严肃人文关怀与时尚文化浪潮的互动共生的格局，高度重视育人使命，弘扬“像巨匠一般劳作，像哲人一般思考”的“哲匠精神”，坚持“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的“四通追求”，谨守“行健、居敬、会通、履远”的“校训规箴”。在中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和设计等高点学科的“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品质发展的同时，先后开拓面向开放媒体与未来空间的新媒体艺术，面向本土建筑根源思考、批判重建的建筑艺术，面向人文动漫与诗化影像的动漫影视艺术，面向场所建造、众乐塑造的公共艺术，面向手工活化、根脉再造的手工艺术，面向社区美育、精神重建的艺术教育与管理等新领域，并率先创立实践类理论研究的博士培养，率先设立强调“东方智性、生活智慧、科技智能、产业智库”的面向全球设计制造业的“中国设计智造大奖”，在特色视觉文化学科群的创建与优化中，在向艺术高峰挺进的努力中，在文创产业的推进大业中，始终走在前列，勇当高峰。

国美之路更是一条民族艺术精英的育才之路。中国最早的艺术研究生李可染、张眺不仅映身1928年秋天的西湖湖山，而且标示着两条献身理想的成长之路。一条是张眺所代表的民族解放斗士的成长之路。作为艺专最早的共产党人，他以艺术理论与历史的敏锐洞察力，引起林风眠等先生的关注，并在后来的新兴木刻、左联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条路上还有胡一川、彦涵、罗工柳、董希文、曾竹韶等，他们作为革命艺术的旗帜性的人物，铸炼英魂，谱写强音。另一条是李可染所代表的艺术独创的成长之路。“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融汇中西，匠心独造，铸炼艺术的高峰。

同样，在这条路上，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等，横亘在中西之间，襟抱民族艺术独创的理想，他们的艺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共和国的人民艺术思想的熔炼中，在跨界乃至跨国的学术环境之中，学院涌现出一批创造性的青年精英：浙派人物画的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等，写实表现油画的肖峰、全山石、王德威等等。20世纪80年代，经历改革开放最初的觉醒，“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一批英才回校深造，成长为学院师资的骨干队伍。77、78级以及稍后几届的同学们，将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最初交流作为艺术实验的动力，化身校园自我组织的前卫力量，持续地推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中国的新潮运动。他们有的成长为新世纪学院变革与发展的主导力量；有的经历当代艺术的荒原铸炼，返身学院，成为新型艺术教育的开拓者；有的持续地在国际艺坛上，经大浪淘洗，成为蜚声中外的重要艺术家。烽火立校，激流立人。美术学院始终在时代激流中成长，催生了放怀广大、不拘一隅的学术胸怀，催生了自我觉醒、自我组织的主体意识，催生了思痕斑驳、逆流疾进的实验精神，也催生了代代追蹑、品味传承的血脉谱系。

国美之路又是一条视觉东方学铸造的诗性之路。西湖湖山的熏养，江南人文的塑造，从林风眠、潘天寿开始，国美的艺者其路径无论多么殊异，其跋涉无论多么驳杂，他们最后的旨归都是以感人的诗性语言来完成当代东方艺术的创造性活化。这种东方活化的使命理想在九十年历史中不断铸炼着国美主体重返东方的田园体验。那抗战西迁时深入民间、保卫敦煌的东方开启；那从新兴木刻到新版画教学的对民间石刻与水印版画的持续的采风与转化；那20世纪50年代末奠定的人物、山水、花鸟分科，强调临摹的以师古人、师造化而师心独造的中国画与书法的教学模式；那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对中国民艺的



重视及至今日中国大学唯一民艺馆的创立；那由中国传统画论以画人为主体而推出的全球率先的实践类理论博士的培养；那具象表现绘画、体象话语及其方法论的思考与建构；那关于本土建筑学艺匠思考、意境生发的实验性教学，而所有这些学院教学的重要案例，无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学研究和活化的生动现场。今年，我院作为国家美术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提出以东方学研究为特征的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我们要持续深化东方的原典、原文、原作的研究，把尚未被开发的丰富思想开发出来；要不断强化东方的主体意识，不拘于传统的限制，加强东西之间、古今之间的深入对话、同谐共振的精神场所；要让东方学研究融入从毛笔书写到民艺感知的日常生活中，推广到感性品味、价值喜好的社会教育中，活化到代代青年的心中；要将东方根源思想和时代沃土中重新生发的主体意识融汇一体，铸炼自己的诗性经验，催生众多生机勃勃的中国方案，实现东方艺术的优化重生。

自国美校庆八十年开始，我们就深深地感到国美之路的深厚内涵和鲜明特征，感到国美之路代代传人的殷殷嘱托和融合创新的闳博之力。我们开启了一个一个专业的世纪历程的梳理。从这些梳理中，我们重温先师的教诲，回溯激流成长的历程，凝结出每个艺术种类的理想使命和品质特征，在每年的10月至12月举办这些专业的国美之路大展，并出版大型画册。值此学院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将全院14个教学与科研单位的国美之路画册跬成大系，合辑出版。这持续了近十个年头的展览，这洋洋洒洒的30多卷画册，是全院师生合力创作的艺术成果，也是大家献给国美九十年、献给代代先师、献给中国艺坛的学术厚礼。

2017年9月29日

以美育代宗教上所佈局的美育部分，至美育上實只有一部分，而並非三曰授其全。且以世間係宗教之故，而時已距太平府之遠，似為美育是超越的而宗教則計較的；美育是平等的，而宗教則差別的；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則限制的；美育是創造的，而宗教是保守的；宗教的保守的美育為現代宗教，而宗教美育為美育之物而反為禁果。

因甚我著看此美育的建構，雖係後宗教而發展，然為吾善成獨立實驗以成，則反受宗教之累；實和善之兩端，以代宗教，除美育成爲以一對多何等作用，美育的結構就是以美育代宗教，當無往而不利。家庭庭訓子女而謂以美育代宗教，不能不商義也。

撫養及教訓，及世皆大不父母當已衰老，則子女當生而自責任，俾父母得以休息；其化為種草，業上之先導，進與加來陰謀。美育之代宗教，方猶是耳。

但是這個問題，甚為複雜；抑既復有不明瞭不合理之處，愚請諸位指教。

以美育代宗教

我记得十余年前，在丙辰学社演讲，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问题，今日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同人的请属，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诸位请教，这在我个人是一个很（很）难得的机会。

我要预先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宗教，并不是指个人自由的信仰心，而仅是指一种拘泥形式，以有历史的组织干涉个人信仰的教派。

又我所说的美育，并不能易作美术。因从前引我说的屡有改作以美术代教化，故可不专以建筑、雕刻、图画与其他工艺美术为限；而所谓美育则不特包括音乐、文学等，而且自然现象、名人言行、都市建设、社会文化；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所以不能改为美术。

我所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有下列两种原因：

(一) 宗教的初期，本兼有智育德育美育三事，而尤以美育为引人信仰之重要成分。及人智进步，物质科学

我记的四十几年前，石而原学社演讲，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见解，曾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同人讨论过，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本而诸位请教；现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难得的機會。

即立该先聲明的，是想所說的宗教，准是提倡人自由的信仰心，而僅是持一種拘泥形式，以有歷史的組織干涉個人傳而的教派。

諸君請勿誤解。至於教會的禮貌，則非我所要說的。我所要說的是美育，或曰美術，雖有其限制，但政治叫人而謂美術，它以真善·雅致·圓滑為美，工藝·藝術而外，而所謂美育，則不

特立教育者，大學年分而目是，而且自此以家爲人行，社會文化者本建設；凡合於美學的條件，而足以感人者，都當^被美育，所以不能改為美術。

神所以主教以美育代宗教，有下列两种原因：

(一) 宗教^的初期，本非有智育德育矣，育三草亦尤以美育為引人信仰之主要成分。及人智进步，物质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渐成立；宗教上智育德育的教训，显见幼稚，不能不讓諸科学家之研究，而西生出新宗教；所以只能维持舊而後信往古惑；不然者，譬特其儀法之美育的初步而已。(迹象上的美与精神上的美)

与社会科学逐渐成立；宗教上智育德育的教训，显见幼稚，不能不让诸科学家之研究，而宗教之所以尚能维持场面，使信徒尚恋恋不忍去者，寔恃其所保留之关系美育的部分而已（迹象上的美与精神上的美）。

(二) 现代宗教上所保留的关系美育部分，在美育上实只为一部分，而并不足以揽其全。且以其关系宗教之故，而时时现出矛盾之迹：例如美育是超越的，而宗教则计较的；美育是平等的，而宗教则差别的；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则限制的；美育是创造的，而宗教是保守的。所以到现时代，宗教并不是为美育之助而反为其累。

因是我等看出美育的初期，虽倚赖宗教而发展，然及其养成独立资格以后，则反受宗教之累；而且我等已承认现代宗教，除美育成分以后，别无何等作用，则我等的结论就是以美育代宗教。在家庭间子女当幼稚时期，不能不受父母之抚养教训，及其长大，而父母业已衰老，则子女当出而自负责任，俾父母得以休息；其他各种事业上之先进与后进，亦或互相乘除，随时期而更迭。美育之代宗教，亦犹是耳。

但是这个问题，甚为复杂，我所说有不明瞭（了）不合理之处，还请诸位指教。

总卷·序

高士明

化而裁之，存乎变；
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系辞上》

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条道路绵延起伏，虽风雨如晦，却馨香永续。从蔡元培、林风眠、吴大羽、黄宾虹、潘天寿，到赵无极、吴冠中直至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数代同仁们历经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于民族危机中奋起，在时代问题中自新，几代人铺就和践行着这一条“国美之路”。这条悠长深远的道路，是我校艺术与思想发展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扎根中国大地的现代艺术教育之路，更是一条立足传统、自主创新的中国艺术复兴之路。

《国美之路大典》总卷分上下两册，旨在从新文化、新中国、新时期与新世纪四个大时代中，探寻这条跨越世纪的学术脉络，追溯中国现代美术创造和教育的发展历程，考察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国美艺术精英们产生了怎样的问题意识，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又进行了怎样的实践？

(一)

中国美术学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90年前，蔡元培先生在新文化的激越浪潮中创办国立艺术院，志存高远。在1928年4月9日补行开学式的讲话中，他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蔡元培先生这句话是他“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延伸。蔡先生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在1928年大学院制订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国立艺术院，正是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最主要的实践阵地。

何谓“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对蔡元培来说，“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然则美育何堪此大任，作如此之贡献？在深受康德、席勒、兰普雷希特影响的蔡元培看来，这是因为美有两种特性：一曰普遍，二曰超脱。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

國立藝術院

調和東西藝術

創造時代藝術

介紹西洋藝術

整理中國藝術

私之。……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所以美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

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这是美育之于当日国人最为关键之处。美之对象，天下为公，可以与人同乐，亦可以使人舍己为群，这是普遍性。美感之发动，陶养性灵，激荡情感，可以使人以身许国，不计祸福，不顾生死，以热烈之情感奔赴之。这就是蔡元培在我校开学致辞中所说的“勇往直前，大无畏的精神，奋发的情感”。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这是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他为中国建设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议。”然则蔡元培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美育在其心中之价值绝不限于新文化之建设，更不只是艺术之专业教育，而首先在乎新时代的立人之德，在乎新社会的革命大业。

1924年，以林风眠、林文铮、刘既漂、王代之为首的一批旅法艺术家，在德法边境斯特拉斯堡的莱茵宫举办了海外首个中国美术展览会。这次艺术展成为那个年代振奋国人心志的一次文化宣言，在《东方》杂志关于该展览会的报道中，林风眠被称作“中国留学美术者之第一人也”。正是通过这次展览，林风眠及其艺术群体进入了当时旅居法国的蔡元培先生的视野。四年后，蔡先生力邀林风眠组建国立艺术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历史由此展开。这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则成为中国美术学院的一段“前历史”。

新文化运动初期，与徐悲鸿等同样留学法国的艺术家相比，林风眠和他的同志们感知到了不同的欧洲艺术精神，对于中国艺术之前途也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今天看来，徐悲鸿与林风眠这两种方案的差异，源自他们对中国艺术传统的不同诊断。徐悲鸿认为中国画缺乏科学之基础，故师法当时在欧洲已然式微的写实主义以补充之；而林风眠认为中国画之弊在其陈陈相因，缺乏时代之气息、创造之精神，故择取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以矫正之。于是，徐悲鸿选择了写实主义，林风眠选择了现代主义。林风眠对现代主义的选择在当时还有两个更加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深受东方艺术影响的现代主义可以作为东方新艺术之奥援，其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现代主义富有批判性的“艺术运动”适足推动老大民族之更新。

早在1924年，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等一批旅法青年就在巴黎成立了“霍普斯画会”，作为海外艺术运动社。霍普斯是太阳神亚波罗的别名。据林文铮讲述：“神女拉端（Latone）与天帝祝彼得（Jupiter）交而生亚波罗。拉端即黑夜之义，祝彼得即天空之义，太阳亚波罗——又名霍普斯（Phoibos）——乃生于黑夜天空之谓也。相传拉端因将产亚波罗而飘荡无着落，卒寄身于德鲁斯（Delos）浮岛上，经了四昼夜的绝大痛苦，才生下亚波罗。德鲁斯在希腊文原义为星光，意谓黑夜中别无光明，只有稀微的星光而已。至于分娩困苦之寓意，即是说太阳欲从黑暗中现出来，须经过绝大的奋斗和挣扎。亚波罗一出世，即赋有无敌的魄力，身披薄纱，满头金黄的卷发，腰悬弓矢，美丽绝伦。此说即象征黎明的太阳初尚披着薄雾，俄而显露头角，强烈无比，金黄的卷发即其初升时灿烂的光芒，弓矢亦其热烈的光线也。”

国立艺术院以“亚波罗”作为校刊之名号，正是表明其承继“霍普斯画会”之精神，推动艺术运动——“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之志业。正如林文铮所说：“我们既然是艺术运动界之一份子，那么势必不揣冒昧，毅然树起我们的艺术观之旗帜，就是亚波罗的精神！”亚波罗所归属的希腊精神——“对于来世既无坚决之信仰，势必鼓其勇气化现世为乐土，以遂其生之欲。”希腊精神所带来的奋发气息，最能够“促进我们老大民族向上的精神”。

国立艺术院是艺术运动之策源地，但艺术运动实先于国立艺术院之创立，或者说，对林风眠们而言，国

立艺术院正是为艺术运动而设。这一点虽与蔡元培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却统一于大学院为新生的国立艺术院所设置的三大宗旨：一为培养专门艺术人才，二为倡导艺术运动，三为促进社会美育。

这三大宗旨彼此关联。在发表于《亚波罗》第一期的檄文《我们要注意》中，林风眠指出：“艺术运动该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要从创作者本身着眼，怎样才可以使艺术时时有新的倾向，俾不致为旧的桎梏所限制；第二，要从享受者的实际着眼，怎样才可以使大家了解艺术，使可从艺术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观念，同正当感情的陶冶。”林风眠所说的两个观点虽然着眼各异，却都有赖于培养专门之艺术人才。所以林风眠掷地有声地宣称：“我们愿将国立艺术院，作为艺术运动人才的集中处所，大家真心肯以艺术为终身致力之鹄的同志，得以安心努力，维持其致力之初心。……并且从提倡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为中国社会一线稀薄的光明！”

(二)

1937年11月，国立艺专师生辞别西子湖畔的悠游岁月，踏上漫漫西迁之途。直至1946年深秋复员，九年间辗转逶迤，五易校长，堪称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透过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国美血脉中一种最为根本性的精神，于流离困苦、内外煎迫之际，犹自弦歌不绝，初心不改。

1940年7月1日，我校第二任校长滕固先生在其致艺专同仁的信中写道：“每念遘兹屯蹇，校势缀旒；物力艰难，设备缺乏，筚路蓝缕，不啻流离。苟非大有为之人，难期措置学校于磐石之固。……今者，敌寇窥觎南服，徼外未夷。……大义所昭，何忍褰裳遽去！惟当更凜风雨同舟之谊，益策驽骀十驾之愚。第校事杌陧，非伊一朝，贞观未显，化迹犹滞。固谬膺斯任，履薄临深，内外责难，交于一己，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纵是非或淆于今听，必功过自定于他年；恩怨初无所容心，毁誉亦置之度外。”信中拳拳之心，沉痛之情，今日读之，犹令人胸内如沸。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办学资源愈多，声望愈隆，而学界对西迁岁月的追慕怀念却也日甚，究其根本，当下高校在“大楼”林立之际，所匮乏者岂止梅贻琦校长所谓的“大师”，更有滕固校长“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

当此困苦窘迫之时，滕固先生所关心的，依旧是教育之根本：“一、提高学术水准，树立笃实之学风；严格教学，增进学生课业。二、确立中心思想，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务使一一为国家有用之人材。三、以本校艺学之造诣，倡导社会，期于恢宏艺教，建设国家新时代之艺术。”因为他始终坚信“学府由来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我校之教育当“以平实深厚的素养为根基而上达崇高伟大的极诣”。他相信，“我们这新时代的艺术，其特质必为笃实雄健，表现我民族的美德，足以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世代，而使之绵延无极。”恰如1938年他为艺专确立的校训“博约弘毅”所示——“立身行己，贵乎博约；开物成务，期以弘毅”。“苟人能负重任，人人能致远路，则不特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世界人类亦将同蒙福利。完成一己之志业在此，所以图报国家者亦在此。”其对艺专学子之期许可谓大矣！

“血泪飞鼙鼓，江山泣鬼神。捷闻终有日，莫负储甘醇。”潘天寿先生西迁途中所作诗句，不言颠沛流离之苦，惟感神州陆沉之悲，道出山河复兴之志。正是因为有如此博大坚忍之心志，我校师生才能够在漫漫西迁途中，维系住一个东西融合、古今贯通的艺术殿堂。西迁九载，这座漂泊的殿堂群英荟萃，众星璀璨，师生们在坚持教学创作、宣传抗战的同时，还实现了国画专业的独立，确立了最早的工作室制度，创作了大批纪念